

内山完造 生为中华友, 歿作华中士

内山书店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夫妇于1917年在上海开设的。从1927到1936年,据《鲁迅日记》,鲁迅出入内山书店512次,内山完造还给鲁迅设了个专座,书店成为鲁迅最后十年的“会客厅”。

作家、教育家夏丏尊说,“内山完造实在是20世纪百年间彼此有过太多不幸的中国和日本共同之幸。”他写的墓志铭也最能概括内山完造的一生——“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歿作华中士。”

28岁来到中国

1885年1月11日,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后月郡芳井村。

这是一个底层少年,贫穷、调皮、不爱学习。四年级,家人决议让他放弃学业,赴大阪做买卖。内山心底很高兴,“我对家父一个人独食白米饭而其他人均吃半麦饭这件事不满,如果去大阪奉公,三餐皆食白米饭。平时再苦,也绝不回头,每天都是过节。”

自此,内山完造脚登草屐,拿着两只内盛松茸的蒲草包就上了前往大阪的火车,“活像山上的小猴子。”初入城市当学徒的内山,抵挡不了诱惑,从大阪到京都,度过了尔虞我诈的混乱青春期。

1913年,内山完造28岁。前一年他刚刚加入基督教,结识了牧野虎次牧师。一天,做完礼拜,牧野问他:“你将来有何打算?”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凭的内山出于本能答道:“我对做买卖已经厌倦了。”牧野问:“你为什么讨厌做生意呢?”“都是成天瞎话溜舌,不说谎

做不成的买卖。”

牧野推荐他到大阪北滨一丁目的参天堂药铺,那里有一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当年3月20日,内山完造乘坐从神户港启程的春日丸号赴沪。

内山完造到了上海,住在吴淞路义丰里164号,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6年1月,内山与美喜子结婚。1917年,内山夫妇在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开设了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创设书店的想法来自妻子内山美喜子。他一贯认为日本妇女受男性压迫的根本在于经济不独立,“人之所以为人,其被称为人格的根本条件是能够创造自立的生活。”所以他用70日元盘下了一个小书店,用空了的啤酒箱和木纸板做了一个两层的简易书架,让同为基督教徒的妻子卖《赞美诗》《圣经》等书籍。1919年,参天堂老板去世后,内山完造被解雇,开始与妻子专注于书店的经营。

“转运站”

此时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期,新思潮需要大量的文学和思想营养。加上上海日侨及留日归国知识分子的增加,内山完造开始销售日文书籍。先是日本留学青年,再到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山书店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光顾。

“内山完造作为一个非常资深的商人,肯定会观察、感受到中国一种社会思潮的嬗变。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整个社会对左翼思潮的倾斜,是那个时代知识

分子内心的一种选择。”作家刘柠说,“但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读物,所以说,日本书店和日本读物,实际上成了中国一代甚至几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转运站。”

除了书籍,还有对谈。内山完造在书店进出口处摆了个石库门(对开折合门),又在店里放了一张圆桌,四周摆了几张长椅,“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1922年,内山书店开始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谈话场所,所谓“文艺漫谈会”。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称,“在内山书店堆积书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参加座谈会……通常是两人开始,随后增加至五人、八人,最后大家围坐着畅谈起来。”据1955年内山完造《老朋友》一文,当时,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谢六逸、傅彦良、王独清、郑伯奇、唐槐秋、陶晶孙与多位日本友人组建了文艺漫谈会,经常在店里喝着粗茶漫谈。内山完造也发挥儿时在教会习得的演讲技能,参与谈话。

1926年,日本东京改造社出版《日本现代文学全集》,每本只卖一元,开创了所谓“元本”出版热潮,又推出《经济学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山书店先后销售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1000套、《世界文学全集》400套、《经济学全集》500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0套。每月进货,甬道里堆如小山,盛极一时。

内山完造与鲁迅

1927年,鲁迅走进了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初期印象是:每次吸着香烟喷云吐雾而来,选书、买书,然后喷云驾雾而去,“来去都有种飘飘然的感觉……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

对于鲁迅,内山也竭尽所能地施予帮助。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很明显能够看出他对鲁迅的多次营救:

1930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被通缉,在内山完造家中避难。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害,鲁迅遭遇威

胁,通过内山完造躲避在一家日本开办的旅馆小间里。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一颗子弹打到了鲁迅家中。鲁迅家遭大批日军搜查,他转移到内山书店。1933年,杨杏佛被杀,鲁迅参加了悼念活动,回来后在内山家避难。

除了鲁迅之外,内山完造也庇佑了非常多进步人士。另外,内山完造对鲁迅木刻版画的赞赏值得一提。他很早就意识到鲁迅木刻版画的價值。还将做美术老师的弟弟内山嘉吉介绍给了鲁迅,与鲁迅一起教授青年版画。

遗骨安葬在上海

日本投降后,上海内山书店也结束了营业。因与郭沫若、田汉等人走得太近,1947年12月7日,内山被国民政府强行遣返回国,这年他已是62岁。

回国后,内山完造仍然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48年2月,内山在日本开始作“中国漫谈”全国讲演,他的整个后半生从北方的北海道到南边的九州,足迹遍布全日本,巡回演讲超过800场。

1950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这天,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代表(包括爱国华侨的代表)共1000人在东京召开大会,宣告“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选举内山完造为协会理事长。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决心实现日本人民给予他的神圣使命,为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不懈努力。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特地邀请内山老人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这时内山已有74岁高龄,健康欠佳,然而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临行前还同亲友们一起合影。在他9月19日到达北京时,突发脑溢血症,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9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郭沫若、廖承志、楚图南、阳翰笙、田汉、许广平、梅兰芳等200多人参加。按照内山生前的遗愿,其遗骨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综合自《南方人物周刊》卢琳绵/文;《国家人文历史》黄金生/文

陈宝箴以船劝说曾国藩

清末,管理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军政事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楨发生矛盾。起因是,曾国藩的湘军军饷紧缺。为了筹措军饷,曾国藩要求地方政府予以配合,从各自省份的财政中拨出一笔钱,接济湘军。安徽、江苏两省对于曾国藩的要求没有异议,唯独江西巡抚沈葆楨拒绝执行,理由是江西财政困难,没钱。只因军饷一事,曾国藩和沈葆楨闹得十分不愉快,不再来往。其后,沈葆楨想缓和两人的关系,写信向曾国藩致歉,曾国藩心里的芥蒂根本没有消除,对沈葆楨的示好毫不理睬。

在曾国藩身边的陈宝箴知道这件事,打算从中调解。一天晚上,他与曾国藩闲谈。陈宝箴说:“总督大人,最近,我在读书时,看到一个故事,觉得很有寓意,想给您讲一讲。”陈宝箴说:“一艘船在大海上航行,遇到

大风,甚为凶险。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掌舵人与撑篙人、划桨人相互指责谩骂。不久,大风停了,船安全靠岸,大家摆酒,庆贺平安归来,互相慰劳。其实,他们都是粗人,平日里喜怒无常,遇到大风时,因为害怕性命有忧,才会互相指责谩骂,做得过分罢了。”曾国藩听完,若有所思地说:“船夫们互相责怪,是怕翻船,并无私心;既然船已经靠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何必再生气呢?”

听到这里,陈宝箴转入正题:“以往,你与沈巡抚的不愉快,不过是纠缠于军费问题。如今,两江地区安全无事,为什么你们的嫌隙不能消释呢?”曾国藩若有所思。第二天,他放低身段,主动给沈葆楨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处事不当,他深表歉意,希望与沈葆楨重修旧好。沈葆楨见信,颇为感动,两人最终重归于好。 刘占青/文